

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与现状

——兼论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

郑建君

内容提要:美好生活是个体基于一定生活标准对其当下生活状态所形成的积极的主观体验与评价结果,反映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人民群众的主导需求。本研究以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作为测量人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核心变量指标,开发和编制了测量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调查问卷;并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201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公民对美好生活感知的评价处在中等偏上水平,在各分量表及具体维度的得分比较上,不同群体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时,有关“三感”关系的模型检验结果还发现:获得感是幸福感形成的重要基础,安全感同时发挥了中介和调节的影响作用,在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扮演了“连接器”和“催化剂”的角色。

关键词:美好生活 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一、从实现温饱到全面小康:公众对美好生活的感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一关键性判断,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向往是相对应和一致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我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深化,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物质文化需要”向高品质“美好生活需要”转变这一客观现实。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表现为由过去满足基本物质文化的生存性需求向更高层次、更品质的发展性需求的转化;^②其中,生存性需求的满足是美好生活的基础,而发展性需要的满足则是美好生活的目标。与此对应,有研究者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应于物质性、社会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19ZDGH0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冯大彪:《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意蕴、当代价值与实现路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6期。

性和心理性三种类型的需要,并以此对接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领域。^①其中,除了物质性需要领域的感知、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之外,社会性和心理性需要所包含的社会安全、保障、公正以及个体的自我实现和人际之间的相互尊重等,其体验和测量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性。因此,在认识和理解美好生活这一概念时,除了强调其本身由多种需求集合表现之外,还应明确美好生活是人们所处客观现实与其主观感受的统一、叠加结果。从性质来看,美好生活是个体对其所处当下生活状态所形成的一种主观性的积极体验与正向评价;^②其过程既有理性的思考分析,又有感性的感知比较。因此,可以将美好生活看作是个体基于一定生活标准对其当下生活状态所形成的积极的主观体验与评价结果。

首先,有必要对美好生活与生活质量做出比较。加尔布雷斯提出的“生活质量”概念,是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总体性评价,反映了个体对其最重要的需求、目标或意愿得到满足的程度的主观评价;^③其包含内容涉及广泛,例如自身健康、自尊、人生观、生活水平、工作、娱乐、学习、社会服务、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等。最初对生活质量的测量,主要集中于对客观生活状况、水平的评价;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人们逐渐意识到那些主观性因素同样会对人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影响。至此,有关生活质量的研究,逐渐将研究主体对主客观因素的评价感受整合起来,形成了既反映客观生活质量、又体现主观认知感受的测量体系。^④但是,生活质量概念及其结构内涵,与我们所关注的美好生活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一方面,与生活质量概念最初侧重对个体客观生活状况的描述性评价不同,美好生活概念在提出之始,就直接指向为一种针对现实生活的主观积极性评价;另一方面,在评价体系结构上,美好生活的测量不仅反映了个体对其生活状况的主客观两方面内容(例如物质生活、社会心理特征等)所进行的评价,同时还反映了不同个体对相同生活状况的差异性感受信息。

尽管新近生活质量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对公民积极感受(包括生活满意感、幸福感、积极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等)的测量,^⑤甚至直接将生活满意感、幸福感作为生活质量的测量指标,^⑥但其所展现的内容仍无法涵盖美好生活这一概念本身所蕴含的范畴。首先,从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其本质在于人民生活需求内容的升级,体现了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样性和高品质,^⑦不仅包含传统的物质生存需要,还包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更高层次的需要;不仅包括个人层面,还包括家庭关系、国家与社会层面。^⑧其次,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强烈的时代发展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对我国发展实际状况的科学、精准判断,不仅反映了党和国家未来工作的重点方向,更准确表达和回应了人民心中的意愿、诉求。再次,美好生活是个体

① 何星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论坛》,2017年第11期。

② 张卫伟、王建新:《美好生活的多重价值内涵及其现实构建》,《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4期。

③ Frisch, M. B., Cornell, J., Villanueva, M. and Retzlaff, P. J., “Clinical Valid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A Measure of Life Satisfaction for Use in Treatment Planning and Outcome Assessment.”,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Vol. 4, No. 1, 1992.

④ 卢淑华、韦鲁英:《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

⑤ Frisch and B., M., “Predictive and Treatment Validity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Assessment*, Vol. 12, No. 1, 2005.

⑥ Frisch, M. B., Cornell, J., Villanueva, M. and Retzlaff, P. J., “Clinical Valid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A Measure of Life Satisfaction for Use in Treatment Planning and Outcome Assessment.”,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Vol. 4, No. 1, 1992;邢占军:《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社会》,2006年第1期;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

⑦ 何哲:《从硬治理到软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一个趋势》,《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12期。

⑧ 王俊秀、刘晓柳、谭旭运、苗瑞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内涵、体验与获得感》,《红旗文稿》,2019年第16期。

对生活不断完善、提升体验下的认知判断与满意感受,不仅反映了对当下生活的满足与幸福,同时也反映了对未来生活的期许与信心。因此,美好生活具有个体心理认知与体验的时空跨越性。

二、美好生活感知的结构与测量

对于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最为全面、客观、准确和科学的结构体系,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并列提出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三感”是判断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是否满足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的主要评判依据。^①因为美好生活所关注的,不单是人民群众的客观物质需求,还涉及更高层级的主观精神感受。^②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上,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以“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根本目标,^③最终真正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以实现和满足。为此,本研究将从“三感”视角切入,构建和形成用于测量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评价的调查问卷。

(一) 获得感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作为一个本土化概念,“获得感”极为准确、生动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强烈期许与价值表达。同时,“获得感”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全民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治理格局下,评估改革发展成效的新标杆。^④在此,可将获得感(Sense of Gain)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在自我处境持续改善、自我状况不断提升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积极心理体验,是一种建立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获得感是个体在与自身及他人的比较过程中形成的,其内涵与既有的概念——“相对剥夺感”相对应。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是个体或群体通过与参照群体横向或纵向比较而感知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进而体验到某种消极的主观认知和情绪体验。^⑤一旦个体或群体产生相对剥夺的心理体验,极易形成负面的情绪和行为反应,甚至引发群体性行为。^⑥

对于获得感的结构及测量,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证的视角进行了探索。依据目前的成果,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主要是采用二手数据资料、基于比较及其过程对获得感形成的作用来完成的。例如王浦劬等人采用单一测量题目将获得感划分为纵向、横向和总体三个维度;吕小康等人基于纵向比较结果,将个人发展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和政府工作满意度四个维度用于获

① 冯大彪:《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意蕴、当代价值与实现路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6期。

② 辛向阳:《深刻把握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和伟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7期。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④ 邢占军、牛千:《获得感:供需视阈下共享发展的新标杆》,《理论学刊》,2017年第5期。

⑤ Khan, A. K., Quratulain, S. and Crawshaw, J. R.,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screte Emo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justice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s: A Study in Pakist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Vol. 28, No. 1, 2013; 熊猛、叶一舵:《相对剥夺感: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3期。

⑥ Osborne, D., Smith, H. J. and Huo, Y. J., “More than a Feeling: Discrete Emotion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actions to Workplace Furlough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8, No. 5, 2012; Smith, H. J., Pettigrew, T. F., Pippin, G. M. and Bialosiewicz, S., “Relative Deprivation: A Theoretical and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6, No. 3, 2011.

得感的构建与测量。^① 第二种主要是基于获得感的影响因素或来源而编制的。郑风田等将获得感的指标体系建构为物质和精神两个部分;文宏等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将获得感提炼为经济、政治与民生等三个维度;同时,还有学者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角度,将获得感设定为政府服务、社会民生、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和人居环境等五个因子。^② 第三种主要是基于获得感的概念内涵与过程而开发的。董宏杰等认为,中国人获得感包含有获得体验、获得环境、获得内容、获得途径和获得分享等五个维度,反映了个体对获取自身需求满足的内容、实现途径与所需条件的认知评价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心理体验。^③

(二) 安全感

安全感的满足,是人民群众感受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标之一,体现了我们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既重视国家安全又重视人民安全的特点。据此,可将安全感(Sense of Safety)定义为个体所具有的一种长期而稳定的心理诉求与体验,不仅体现在对当下生存现状的无忧、可控,还表现在对来自自身及整个国家、社会的信心和可见预期。安全感所反映的这种心理需求,指向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经济民生、政治秩序、社会风貌等多维结构的认知与信心,其结果将会带给个体以身心、财产、生存与发展等方面的可控、无忧、放心和舒心体验。^④

不同学科对安全感研究的关注有所差异,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和科际交叉融合,研究者对安全感的关注除公共安全领域外,经济、社会、环境、人身财产等都被纳入到安全感考察的范畴。此后,研究者将安全感的概念由个人层面扩展至国家、社会层面,对其概念构建和测量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个体视角。例如,张玉春对北京市民安全感的测量,将影响安全感评价的指标概括为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经济安全、政府保障、环境安全和个人心理素质等五个方面;王俊秀从需求理论出发,把安全感分为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劳动、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感八个方面;汪海彬等针对城市居民构建了由社会稳定、家庭安全、公共安全、社区安全、职业安全和身体安全等六个维度组成的安全感测量体系;新近一项大调查从生活生产安全、情感支持和未来生活预期三个方面对中国公民的安全感进行测量,发现多数个体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安全感。^⑤

(三) 幸福感

将人民群众是否获得更多幸福感作为检验我们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品格。早期有关生活质量的研究认为,幸福是个体对生活状况的积极评价,是将自身生活状况与他人和过去的生活状况进行有利性比较的产物。^⑥ 幸福生活不

① 王浦劬、季程远:《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期;吕小康、黄妍:《如何测量“获得感”?——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② 郑风田、陈思宇:《获得感是社会发展最优衡量标准——兼评其与幸福感、包容性发展的区别与联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期;文宏、刘志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邵雅利:《新时代人民主观获得感的指标构建与影响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③ 董洪杰、谭旭运、豆雪姣、王俊秀:《中国人获得感的结构研究》,《心理学探新》,2019年第5期。

④ 俞国良、王浩:《社会转型:国民安全感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3期;宋宝安、王一:《利益均衡机制与社会安全——基于吉林省城乡居民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

⑤ 张玉春:《北京市居民安全感指数的编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王俊秀:《面对风险:公众安全感研究》,《社会》,2008年第4期;汪海彬、姚本先:《城市居民安全感问卷的编制》,《人类工效学》,2012年第4期;石晶:《新的美好生活,新的感受期盼——当前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国家治理》,2017年第44期。

⑥ Shin, D. and Johnson, D.,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5, No. 1 ~ 4, 1978.

仅包括良好的物质生活,还包含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认同关系及个体自身的精神状态。^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幸福感更多反映了个体对自身期望与其实际生活状态的统一性、和谐性和稳定性。尽管现代心理科学将幸福的类型细化为主观幸福感(快乐体验)、心理幸福感(自我实现)和社会幸福感(社会价值)。^②但是,从幸福感知主体的角度来看,幸福感最直接体现于个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状况、以及与生活相关联的方方面面的满意程度。^③因此,本研究也侧重于从个体的主观幸福体验出发,将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定义为个体对所具有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以及现有生活的各方面与自身预期的一致程度的主观感知。

(四)本研究拟完成的主要任务

在上述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重点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任务。

目前,有关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整体性测量工具,相对缺乏。已有研究多针对其中的个别变量指标,例如获得感、安全感等。特别是针对获得感或安全感的测量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资料多为二手数据,且缺少必要的信效度检验,难以作为同类研究的基础性测量工具予以推广。为此,本研究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评价的测量结构,并编制具有良好信效度表现、可供广泛应用的问卷工具,这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第一个任务。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目标,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是一致的。为了能够更为精准把握人民群众的具体需求、找准工作中的不足与短板,我们有必要科学、客观、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公民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评价,特别是在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相关测量指标变量及维度上的表现与差异。为此,本研究拟运用自编的测量工具对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现状进行初步描述,并检验不同群体的表现差异,这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第二个任务。

现在,有大量研究从理论上阐述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之间的逻辑关联。研究者普遍认为:获得感是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基础与来源,安全感是获得感和幸福感形成的条件与保障,而幸福感是获得感和安全感最高的表现形式与目标。^④但上述分析,缺乏必要的实证检验和有效的量化证据支持。为此,针对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评价测量的内部结构,本研究拟对“三感”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探索性分析,这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第三个任务。

三、数据来源与测量

(一)样本基本情况

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项目组主持,在2019年采用线上和线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年满18周岁的我国城乡居民进行问卷发放。其中,线上、

① 陆汉文:《论生活世界的内涵与生活质量测量》,《学术论坛》,2005年第11期。

② Kahneman, D., 2000, “Experienced Utility and Objective Happiness: A Moment-Based Approach”, In D. Kahneman and A. Tversky (eds.),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pp. 673 – 69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③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5, No. 1, 2000.

④ 陈永涌、任梓荣:《中国梦与国民的幸福工程:“积极型社会”的建构》,《青海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金伟、陶砥:《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旨归: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马振清、刘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深层逻辑联系》,《国家治理》,2017年第44期;石晶:《新的美好生活,新的感受期盼——当前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国家治理》,2017年第44期;薛念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大现实意义》,《国家治理》,2017年第47期。

线下调查分别获得有效数据 1936 份和 1944 份,共计 3880 份。在抽样操作上,参考都会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基数比例来设定抽样预期数量。具体而言,线下调查采用方便抽样,在创新项目组当年进行调研的三省市进行调查,以村居为单位进行随机抽样,每个村居参与调查人数不超过 50 人,累计选取村居 40 个;线上调查委托专业网络数据平台实施,从其线上样本库中依据所需各地样本数量随机抽取。参与此次调查的中国公民,年龄在 18~89 周岁,平均年龄 34.88 岁,标准差 10.61;男性 2283 人(58.84%),女性 1583 人(40.80%),信息缺失 14 人(0.36%);其他指标的人数分布及比例见表 1。

表 1 样本分布基本情况

指标	类型	人数(个)	百分比(%)	指标	类型	人数(个)	百分比(%)
区域	东北	171	4.41	学历	初中及以下	277	7.14
	东部	1866	48.09		高中(含高职高专)	726	18.71
	都会区	441	11.37		大学(含大专)	2006	51.70
	中部	960	24.74		研究生及以上	857	22.09
	西部	442	11.39		信息缺失	14	0.36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1427	36.78	家庭所在地	农村	644	16.60
	共青团员	756	19.48		乡镇	549	14.15
	群众及其他	1689	43.53		县城	775	19.97
	信息缺失	8	0.21		城市	1900	48.97
个人月均收入	1500 元及以下	618	15.93		信息缺失	12	0.31
	1501~3000 元	902	23.25	家庭年均收入	约 1.5 万元以下	353	9.10
	3001~5000 元	1185	30.54		约 1.5 万~5 万元	1168	30.10
	5000 元以上	1167	30.08		约 5 万~8 万元	730	18.82
	信息缺失	8	0.20		约 8 万~10 万元	499	12.86
家庭收入来源	农业生产	219	5.64		约 10 万元以上	1119	28.84
	工资	2642	68.10		信息缺失	11	0.28
	家庭经营	354	9.12				
	在外务工	381	9.82				
	其他	272	7.01				
	信息缺失	12	0.31				

(二) 变量测量

对本研究核心变量的测量,获得感与安全感采用自编问卷,幸福感采用既有相对成熟的问卷。

1. 获得感的结构与测量。根据已有研究对获得感的内涵界定及相关分析,我们最初编制了 20 道题目。在正式施测前,由已经取得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专业博士学位且具有高级职称的四名研究者对初始题目进行逐一讨论分析,经过删除、合并后,最终获得用于施测的题目 17 道;问卷采用 7 点方式计分,从 1~7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我们将最终获得的 3880 份有效数据随机分半,其中 1936 份数据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EFA),1944 份数据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CFA)。

对用于 EFA 的数据进行可行性分析,结果显示: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为 12933.23 ($p < 0.001$),KMO 度量结果为 0.94 (> 0.70);这表明本研究采用 EFA 能够有效解释变量不同维度之

间的关系,可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Kaiser 正态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对获得感的结构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特征根值大于 1、共同度和因素载荷大于 0.5 的标准下,结合碎石图判断,最终确定了三个因素的获得感问卷测量结构(见表 2)。获得感的测量问卷由 11 个题目构成,并最终汇聚为三个维度,即社会发展获得感、民生改善获得感和自我实现获得感。

表 2 获得感问卷结构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题目具体表述	维度名称及载荷值		
	社会发展	民生改善	自我实现
我能够感受到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社会信任	0.82		
我们的社会正在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0.79		
现在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有尊严	0.74		
我能够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成就感和自豪感	0.63		
现在,我得到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的发展红利		0.74	
目前,老百姓致富增收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0.73	
目前,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正在得到逐步解决和改善		0.70	
我们国家的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等情况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0.57	
我总能在市场上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化产品			0.79
我可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0.71
我能够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参与到发展与改革的进程当中			0.68
特征根值	3.14	2.49	2.30
解释量(%)	28.57	22.65	20.93
总解释量(%)	72.14		

运用 Mplus7 对已获知的三维获得感问卷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结构的各项拟合指标表现较好;其中, $\chi^2 = 462.82$, $df = 41$, $RMSEA = 0.073$, $CFI = 0.97$, $TLI = 0.95$, $SRMR = 0.028$, 载荷值在 0.68 ~ 0.83 之间。随后,基于 3880 份数据对获得感问卷进行项目分析与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维度的题总相关在 0.58 ~ 0.78 之间,且删去任何一道题目都不会引起信度系数的提高;具体到各维度及整体的信度系数,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自我实现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8、0.85 和 0.78,问卷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通过上述结果可知,由 11 道题目、三个维度构成的获得感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信度表现,可以作为该变量的基础性测量工具予以应用。

2. 安全感的结构与测量。参考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有关安全感测量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编制了 21 道初始题目用于测量中国民众的安全感。在题目筛选过程中,同样由已经取得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专业博士学位且具有高级职称的四名研究者对初始题目的表述及内容效度进行逐一讨论分析,在删除语义有歧义或表述不当题目、合并同义题目后,最终确定了 14 道题目用于正式施测;该问卷采用 7 点方式计分,从 1 ~ 7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在具体分析时,将 3880 份有效数据随机分半,其中 1936 份数据用于结构探索,1944 份数据用于结构验证。

同样,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对数据可行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为 11350.27 ($p < 0.001$), KMO 度量结果为 0.94 (> 0.70);这表明基于本研究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能够有效解释变量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Kaiser 正态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对安全感的结构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特征根值大于 1、共同度和因素载荷大于 0.5 的标准下,结合碎石图判断,最终确定了两个因素的安全感问卷测量结构(见表 3)。安全感的测量问卷由 9 个题目构成,并最终汇聚为两个维度,分别为即时性安全感和预期性安全感。

表 3 安全感问卷结构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题目具体表述	维度名称及载荷值	
	即时性	预期性
我的生活环境、交通状况是安全的	0.81	
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0.81	
我对当前的国家安全状况非常满意	0.79	
我很少会担心日常的社会治安问题	0.65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因病因学返贫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少		0.80
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0.79
随着社会经济和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我们的各项权利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0.78
社会发展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0.73
我相信自己或家庭的收入会稳定增长		0.68
特征根值	3.36	3.07
解释量(%)	37.36	34.09
总解释量(%)	71.45	

进一步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安全感问卷结构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二维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表现;其中, $\chi^2 = 271.44$, $df = 26$, $RMSEA = 0.070$, $CFI = 0.98$, $TLI = 0.97$, $SRMR = 0.022$, 载荷值在 0.72 ~ 0.85 之间。运用 3880 份有效数据对安全感问卷进行项目分析与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维度的题总相关在 0.65 ~ 0.79 之间,且删去任何一道题目都不会引起信度系数的提高;具体到各个维度及整体的信度系数,即时性和预期性两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8、0.90,问卷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基于上述结果可知,由 9 道题目、两个维度构成的安全感问卷,表现出良好的结构效度和信度,该问卷适于作为安全感的基础性测量工具。

3. 幸福感的结构与测量。对于幸福感的测量,采用 Diener 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问卷;^①该问卷包含有 5 道题目、一个维度,同样采用 7 点评分。在幸福感的定义操作上,该问卷同时兼顾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反映了个体当下所体验到的生活状况与其主观期望之间的差异。选用该问卷的原因有三:一是该问卷的操作性定义清晰、明确,较好的反映了当下普遍认可的幸福概念理解;二是该问卷是相关研究领域选用最多的测量工具之一;三是该问卷的中文版本被国内研究普遍采用,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信效度表现。在本研究中,我们对其结构效度运用 EFA 进行了复核检验,结果显示: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为 14561.31 ($p < 0.001$), KMO 度量结果为 0.90 (> 0.7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不旋转的方式进行 EFA,最终 5 道题目全部汇聚到一个因子上(以特征根值大于 1、共同度大于 0.3、因素载荷大于 0.5 为标准),各个题目的载荷值在 0.83 ~ 0.91 之间,5 道题目能够解释总方差的 76.84%。此外,信度分析的结果显示:本研究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 0.92。

①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and Griffin, S.,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Vol. 49, No. 1, 1985.

四、中国公民美好生活的基本状况

(一) 总体情况描述

对于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评价,其得分由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三个分量表的得分加总取均值获得。描述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公民对美好生活的感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 = 4.79$ 、 $SD = 1.11$),显著高于组中值($t = 44.31$ 、 $p < 0.001$)。^①具体到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三个变量,其得分的高低顺序依次为:安全感 > 获得感 > 幸福感。获得感总体得分($M = 4.83$ 、 $SD = 1.23$)及所包含的社会发展($M = 4.92$ 、 $SD = 1.33$)、民生改善($M = 4.70$ 、 $SD = 1.42$)和自我实现($M = 4.86$ 、 $SD = 1.33$)三个维度,其得分均显著高于组中值($t_{\text{获得感总分}} = 41.98$ 、 $p < 0.001$, $t_{\text{社会发展}} = 42.93$ 、 $p < 0.001$, $t_{\text{民生改善}} = 30.79$ 、 $p < 0.001$, $t_{\text{自我实现}} = 40.29$ 、 $p < 0.001$);安全感总体得分($M = 5.23$ 、 $SD = 1.15$)及所包含的即时性($M = 5.27$ 、 $SD = 1.20$)和预期性($M = 5.19$ 、 $SD = 1.25$)两个维度,其得分均显著高于组中值($t_{\text{安全感总分}} = 66.53$ 、 $p < 0.001$, $t_{\text{即时性}} = 65.83$ 、 $p < 0.001$, $t_{\text{预期性}} = 59.55$ 、 $p < 0.001$);幸福感的得分($M = 4.32$ 、 $SD = 1.40$),也显著高于组中值($t = 14.11$ 、 $p < 0.001$)。

(二) 性别差异比较

基于不同性别进行描述统计和差异比较(见表4),结果发现:男性对美好生活感知的评价得分显著高于女性;这一表现形态还存在于对应变量及具体维度中,在获得感总体得分与社会发展维度、安全感的即时性维度、幸福感总体得分上,男性公民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性公民。

表 4 不同性别公民的差异比较

		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美好生活
		社会发展	民生改善	自我实现	总体得分	即时性	预期性	总体得分		
女	M	4.82	4.67	4.81	4.77	5.21	5.18	5.20	4.21	4.72
	SD	1.41	1.49	1.36	1.29	1.27	1.27	1.20	1.45	1.16
男	M	4.99	4.73	4.89	4.87	5.31	5.20	5.25	4.39	4.84
	SD	1.27	1.37	1.30	1.18	1.14	1.23	1.11	1.37	1.07
t 检验		3.72 ***	1.30	1.90	2.53 *	2.53 *	0.35	1.51	3.98 ***	3.12 **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下同)。

(三) 学历差异比较

基于不同学历进行描述统计和差异比较(见表5),结果发现:除幸福感外($F = 0.75$ 、 $p = 0.52$),在美好生活感知评价得分($F = 6.22$ 、 $p < 0.001$)以及获得感($F = 14.15$ 、 $p < 0.001$)、安全感($F = 11.04$ 、 $p < 0.001$)总体得分与具体维度($F_{\text{社会发展}} = 14.86$ 、 $p < 0.001$, $F_{\text{民生改善}} = 12.16$ 、 $p < 0.001$, $F_{\text{自我实现}} = 8.74$ 、 $p < 0.001$, $F_{\text{即时性}} = 12.11$ 、 $p < 0.001$, $F_{\text{预期性}} = 10.01$ 、 $p < 0.001$)得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在美好生活感知评价上,“大学(含大专)与初中及以下、研究生及以上”、“高中(含高职高专)与研究生及以上”,得分差异显著。在获得感总得分上,其他三个群体的得分显著高于研究生及以上群体的得分;在社会发展与自我实现维度上,“大学(含大专)与初中及以下、研究生及以上”、“高中(含高职高专)与研究生及以上”,得分

① 在中国美好生活的测量中,依据得分大小极值,可以计算出组中值为4。

差异显著;而在民生改善维度上,其他三个群体的得分显著高于研究生及以上群体的得分。在安全感总得分和预期性维度上,初中及以下群体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群体,大学(含大专)群体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群体;而在即时性维度上,大学(含大专)群体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群体。

表 5 不同学历公民的描述统计结果

		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美好生活
		社会发展	民生改善	自我实现	总体得分	即时性	预期性	总体得分		
初中及以下	M	4.84	4.75	4.76	4.78	5.09	4.86	4.97	4.28	4.68
	SD	1.49	1.48	1.44	1.35	1.37	1.52	1.38	1.51	1.27
高中(含 高职高专)	M	5.01	4.75	4.94	4.90	5.22	5.13	5.18	4.38	4.82
	SD	1.42	1.58	1.47	1.37	1.32	1.34	1.27	1.48	1.24
大学 (含大专)	M	5.00	4.79	4.92	4.90	5.37	5.27	5.32	4.32	4.85
	SD	1.29	1.38	1.31	1.19	1.15	1.20	1.10	1.40	1.08
研究生及以上	M	4.66	4.45	4.67	4.59	5.11	5.17	5.14	4.28	4.67
	SD	1.27	1.32	1.18	1.11	1.11	1.15	1.04	1.31	1.01

(四) 居住地差异比较

基于不同居住地进行描述统计和差异比较(见表 6),结果发现:中国公民不仅在美好生活感知评价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 = 17.13, p < 0.001$);同时,在获得感($F = 28.80, p < 0.001$)、安全感($F = 10.35, p < 0.001$)、幸福感($F = 9.37, p < 0.001$)以及相关维度上的得分($F_{\text{社会发展}} = 22.48, p < 0.001, F_{\text{民生改善}} = 35.30, p < 0.001, F_{\text{自我实现}} = 14.57, p < 0.001, F_{\text{即时性}} = 18.96, p < 0.001, F_{\text{预期性}} = 3.57, p < 0.05$),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居住地为城市和农村的群体,其美好生活感知评价的得分显著低于居住地为乡镇和县城的群体。在获得感总分上,城市居民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居住地群体,乡镇居民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居住地群体;在社会发展维度上,城市居民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类群体,且乡镇居民的得分显著高于居住地为农村的居民;在民生改善维度上,城市居民评价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群体,同时乡镇和县城两地的居民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在自我实现维度上,城市居民得分最低、乡镇居民得分最高,且与其他居住地群体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在安全感总分上,城市居民显著低于其他三类群体,同时县城的居民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在即时性维度上,城市居民显著低于其他三类群体,且农村居民的得分显著低于乡镇和县城居住的群体;在预期性维度上,县城居住的群体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和城市的群体。在幸福感总分上,乡镇和县城居民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和城市居民。

表 6 不同居住地公民的描述统计结果

		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美好生活
		社会发展	民生改善	自我实现	总体得分	即时性	预期性	总体得分		
农村	M	4.97	4.76	4.90	4.88	5.30	5.19	5.25	4.18	4.77
	SD	1.38	1.45	1.34	1.25	1.26	1.32	1.22	1.48	1.17
乡镇	M	5.19	5.07	5.13	5.13	5.47	5.23	5.35	4.49	4.99
	SD	1.30	1.43	1.39	1.23	1.17	1.31	1.17	1.40	1.09
县城	M	5.08	4.93	4.93	4.98	5.43	5.30	5.37	4.47	4.94
	SD	1.27	1.39	1.33	1.22	1.22	1.30	1.20	1.38	1.11
城市	M	4.75	4.48	4.73	4.66	5.12	5.13	5.13	4.25	4.68
	SD	1.33	1.38	1.29	1.20	1.16	1.18	1.09	1.38	1.08

(五) 经济差异比较

对不同个人月均收入中国公民的美好生活感知得分进行描述统计和差异比较(见表7),结果发现:除安全感变量的预期性维度外($F=1.97, p=0.12$),在美好生活感知评价得分($F=3.95, p<0.01$)以及获得感($F=9.92, p<0.001$)、安全感($F=3.17, p<0.05$)、幸福感($F=5.63, p<0.01$)与各分量表具体维度($F_{\text{社会发展}}=12.01, p<0.001, F_{\text{民生改善}}=10.12, p<0.001, F_{\text{自我实现}}=4.21, p<0.01, F_{\text{即时性}}=6.16, p<0.001$)得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中等偏上(3001~5000元)收入群体在美好生活感知评价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群体。在获得感总分上,月均收入为“3001~5000元”的群体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人群,而月均收入为“1501~3000元”的群体得分显著高于“5000元以上”的群体;在社会发展维度上,“5000元以上”的群体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类人群,同时“1500元及以下”的群体得分也显著低于“3001~5000元”的群体;在民生改善维度上,得分最高和最低的群体分别是月均收入为“5000元以上”和“3001~5000元”的两类人群,且分别与其他三类收入水平的群体差异显著;在自我实现维度上,月均收入为“3001~5000元”的群体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人群。在安全感总分上,月均收入为“5000元以上”和“3001~5000元”的两类人群之间,得分差异显著;同时,在即时性维度上,月均收入为“5000元以上”的人群得分最低,且与其他三类人群差异显著。在幸福感得分上,低收入群体(1500元及以下)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类人群,同时“5000元以上”的人群得分显著高于中低收入(1501~3000元)人群。

表7 不同个人月均收入水平公民的描述统计结果

		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美好生活
		社会发展	民生改善	自我实现	总体得分	即时性	预期性	总体得分		
1500元及以下	M	4.89	4.69	4.83	4.80	5.31	5.12	5.22	4.13	4.72
	SD	1.38	1.32	1.31	1.20	1.26	1.32	1.21	1.39	1.11
1501~3000元	M	4.97	4.71	4.82	4.83	5.29	5.17	5.23	4.28	4.78
	SD	1.37	1.55	1.44	1.33	1.25	1.31	1.21	1.48	1.21
3001~5000元	M	5.07	4.86	4.97	4.97	5.35	5.26	5.31	4.36	4.88
	SD	1.28	1.41	1.33	1.20	1.17	1.21	1.12	1.38	1.08
5000元以上	M	4.75	4.54	4.79	4.69	5.15	5.17	5.16	4.40	4.75
	SD	1.32	1.36	1.24	1.17	1.14	1.19	1.09	1.37	1.07

五、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相互关系

(一) 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影响机制与条件

对三者的影响机制与条件进行检验前,除年龄变量外,将拟控制的性别、学历、居住地以及个人月均收入四个类别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中介和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见表8。其中,获得感对幸福感($t=56.07, p<0.001$)、安全感($t=72.97, 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将获得感和安全感同时纳入模型,二者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显著, $t_{\text{获得感}}=30.35, p<0.001, t_{\text{安全感}}=8.03, p<0.001$,且安全感对幸福感的回归系数由0.77降为0.64;此外,获得感与安全感的交互效应对幸福感影响显著, $t=5.53, p<0.001$ 。从上述结果来看,在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安全感可能同时具有中介和调节作用。

表 8 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M1:幸福感		M2:安全感		M3:幸福感		M4:幸福感	
		<i>b</i>	<i>SE</i>	<i>b</i>	<i>SE</i>	<i>b</i>	<i>SE</i>	<i>b</i>	<i>SE</i>
性别	女	-0.10 **	0.03	0.01	0.02	-0.11 **	0.03	-0.11 **	0.03
	年龄	0.01 ***	0.00	0.00	0.00	0.01 ***	0.00	0.01 ***	0.00
学历	初中及以下	-0.15	0.08	-0.31 ***	0.06	-0.09	0.08	-0.11	0.08
	高中(高职高专)	-0.09	0.06	-0.19 ***	0.04	-0.06	0.06	-0.08	0.06
	大学(大专)	-0.11 *	0.05	-0.05	0.03	-0.10 *	0.05	-0.11 *	0.05
居住地	农村	-0.10 *	0.05	0.01	0.04	-0.11 *	0.05	-0.11 *	0.05
	乡镇	-0.03	0.05	-0.06	0.04	-0.02	0.05	-0.02	0.05
	县城	0.08	0.05	0.02	0.03	0.08	0.05	0.07	0.05
个人月均收入	1500 元及以下	-0.17 **	0.06	0.01	0.04	-0.17 **	0.06	-0.18 **	0.06
	1501 ~ 3000 元	-0.16 **	0.05	0.05	0.04	-0.17 **	0.05	-0.17 **	0.05
	3001 ~ 5000 元	-0.19 **	0.05	0.01	0.03	-0.19 **	0.05	-0.19 ***	0.05
获得感		0.77 ***	0.01	0.72 ***	0.01	0.64 ***	0.02	0.64 ***	0.02
安全感						0.18 ***	0.02	0.22 ***	0.02
获得感 × 安全感								0.05 ***	0.01
<i>R</i> ²		0.46 ***		0.59 ***		0.47 ***		0.48 ***	
<i>F</i>		275.15 ***		459.79 ***		263.20 ***		248.48 ***	

运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安全感在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0.1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6.88%。将安全感划分为高、低分组($M \pm 1SD$,下同),简单斜率检验显示:不论是安全感低分组($b_{\text{simple}} = 0.59$ 、 $SE = 0.02$ 、 $t = 24.98$ 、 $p < 0.001$)还是高分组($b_{\text{simple}} = 0.70$ 、 $SE = 0.02$ 、 $t = 29.94$ 、 $p < 0.001$),中国公民的获得感对其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图 1),且两组斜率差异显著, $Z = 3.89$ 、 $p < 0.001$ 。据此可知,个体获得感通过安全感对其幸福感予以正向影响;同时,在获得感对幸福感的影响中,安全感还表现出明显的边界效应,即安全感在二者关系中同时发挥显著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后续分析将重点考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不同维度,对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发挥何种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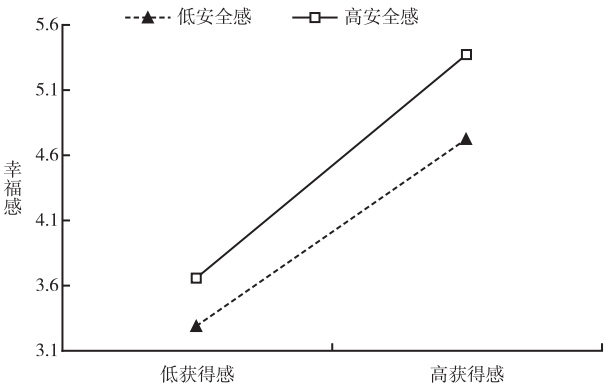


图 1 获得感与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交互作用图

(二) 社会发展获得感与幸福感

考察社会发展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并将安全感的两个维度——“即时性”“预期性”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结果显示:社会发展获得感对即时性安全感($b = 0.67$ 、 $SE = 0.01$ 、 $t = 73.58$ 、 $p < 0.001$ 、 $R^2 = 0.60$ 、 $F = 473.09$)、预期性安全感($b = 0.66$ 、 $SE = 0.01$ 、 $t = 59.95$ 、 $p < 0.001$ 、 $R^2 = 0.49$ 、 $F = 308.74$)和幸福感($b = 0.67$ 、 $SE = 0.01$ 、 $t = 50.61$ 、 $p < 0.001$ 、 $R^2 = 0.42$ 、 $F = 225.47$),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将所有变量同时纳入模型,社会发展获得感($b = 0.50$ 、 $SE = 0.02$ 、 $t = 23.56$ 、 $p < 0.001$)和即时性安全感($b = 0.15$ 、 $SE = 0.03$ 、 $t = 5.56$ 、 $p < 0.001$)、预期性安全感($b = 0.11$ 、 $SE = 0.02$ 、 $t = 4.96$ 、 $p < 0.001$),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2 = 0.43$ 、 $F = 207.05$);此外,社会发展获得感与即时性安全感($b = 0.05$ 、 $SE = 0.01$ 、 $t = 5.78$ 、 $p < 0.001$)、社会发展获得感与预期性安全感($b = 0.05$ 、 $SE = 0.01$ 、 $t = 6.73$ 、 $p < 0.001$)的交互效应,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显著。据此可知,在社会发展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中,安全感的两个维度同时起到中介和调节作用。

中介作用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安全感在社会发展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中,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1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37%。具体来看,即时性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值为0.1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4.93%;预期性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值为0.0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0.44%;两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差异值不显著,95% CI为 $[-0.04, 0.09]$ 。将即时性安全感和预期性安全感分别划分为高、低分组,简单斜率检验显示:对于即时性维度,在低分组($b_{\text{simple}} = 0.47$ 、 $SE = 0.02$ 、 $t = 21.09$ 、 $p < 0.001$)和高分组($b_{\text{simple}} = 0.58$ 、 $SE = 0.02$ 、 $t = 25.59$ 、 $p < 0.001$)中,社会发展获得感对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两组斜率差异显著, $Z = 3.89$ 、 $p < 0.001$;对于预期性维度,在低分组($b_{\text{simple}} = 0.50$ 、 $SE = 0.02$ 、 $t = 24.64$ 、 $p < 0.001$)和高分组($b_{\text{simple}} = 0.63$ 、 $SE = 0.02$ 、 $t = 29.48$ 、 $p < 0.001$)中,社会发展获得感对幸福感影响显著,且两组斜率差异显著, $Z = 4.60$ 、 $p < 0.001$ 。

(三) 民生改善获得感与幸福感

考察民生改善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并将安全感的两个维度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结果显示:民生改善获得感对即时性安全感($b = 0.59$ 、 $SE = 0.01$ 、 $t = 60.23$ 、 $p < 0.001$ 、 $R^2 = 0.50$ 、 $F = 319.98$)、预期性安全感($b = 0.52$ 、 $SE = 0.01$ 、 $t = 45.35$ 、 $p < 0.001$ 、 $R^2 = 0.36$ 、 $F = 178.72$)和幸福感($b = 0.61$ 、 $SE = 0.01$ 、 $t = 47.65$ 、 $p < 0.001$ 、 $R^2 = 0.39$ 、 $F = 200.74$),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将所有变量同时纳入模型,民生改善获得感($b = 0.41$ 、 $SE = 0.02$ 、 $t = 23.63$ 、 $p < 0.001$)和即时性安全感($b = 0.17$ 、 $SE = 0.03$ 、 $t = 6.59$ 、 $p < 0.001$)、预期性安全感($b = 0.19$ 、 $SE = 0.02$ 、 $t = 8.61$ 、 $p < 0.001$),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2 = 0.43$ 、 $F = 207.39$);此外,民生改善获得感与即时性安全感($b = 0.03$ 、 $SE = 0.01$ 、 $t = 3.40$ 、 $p < 0.01$)、民生改善获得感与预期性安全感($b = 0.04$ 、 $SE = 0.01$ 、 $t = 5.27$ 、 $p < 0.001$)的交互效应,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据此可知,在民生改善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安全感的两个维度同时起到明显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中介作用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安全感在民生改善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中,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2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2.79%。具体来看,即时性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值为0.1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6.40%;预期性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值为0.1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6.39%;两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差异值不显著,95% CI为 $[-0.05, 0.05]$ 。将即时性安全感和预期性安全感分别划分为高、低分组,简单斜率检验显示:对于即时性维度,在低分组($b_{\text{simple}} = 0.39$ 、 $SE = 0.02$ 、 $t = 19.30$ 、 $p < 0.001$)和高分组($b_{\text{simple}} = 0.46$ 、 $SE = 0.02$ 、 $t = 23.28$ 、 $p < 0.001$)中,民生改善获得感对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两组斜率差异显著, $Z = 2.47$ 、 $p < 0.01$;对于预期性维度,在低分组($b_{\text{simple}} = 0.41$ 、 $SE = 0.02$ 、 $t = 22.23$ 、 $p < 0.001$)和高分组($b_{\text{simple}} = 0.51$ 、 $SE = 0.02$ 、 $t = 28.38$ 、 $p < 0.001$)中,民生改善获得感对幸福感

影响显著,且两组斜率差异显著, $Z = 3.54$ 、 $p < 0.01$ 。

(四)自我实现获得感与幸福感

考察自我实现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并将安全感的两个维度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结果显示:自我实现获得感对即时性安全感($b = 0.55$ 、 $SE = 0.01$ 、 $t = 47.28$ 、 $p < 0.001$ 、 $R^2 = 0.39$ 、 $F = 200.67$)、预期性安全感($b = 0.49$ 、 $SE = 0.01$ 、 $t = 37.41$ 、 $p < 0.001$ 、 $R^2 = 0.28$ 、 $F = 123.14$)和幸福感($b = 0.60$ 、 $SE = 0.01$ 、 $t = 42.53$ 、 $p < 0.001$ 、 $R^2 = 0.34$ 、 $F = 161.38$),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将所有变量同时纳入模型,自我实现获得感($b = 0.36$ 、 $SE = 0.02$ 、 $t = 21.86$ 、 $p < 0.001$)和即时性安全感($b = 0.25$ 、 $SE = 0.02$ 、 $t = 10.03$ 、 $p < 0.001$)、预期性安全感($b = 0.20$ 、 $SE = 0.02$ 、 $t = 9.18$ 、 $p < 0.001$),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2 = 0.42$ 、 $F = 198.55$);此外,自我实现获得感与即时性安全感($b = 0.04$ 、 $SE = 0.01$ 、 $t = 4.36$ 、 $p < 0.001$)、自我实现获得感与预期性安全感($b = 0.06$ 、 $SE = 0.01$ 、 $t = 7.00$ 、 $p < 0.001$)的交互效应,均对幸福感影响显著。据此可知,在自我实现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安全感的两个维度同时起到明显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中介作用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安全感在自我实现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中,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2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0%。具体来看,即时性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值为0.1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3.33%;预期性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值为0.1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6.67%;两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差异值不显著,其95% CI为 $[-0.01, 0.08]$ 。将即时性安全感和预期性安全感分别划分为高、低分组,简单斜率检验显示:对于即时性维度,在低分组($b_{\text{simple}} = 0.34$ 、 $SE = 0.02$ 、 $t = 17.71$ 、 $p < 0.001$)和高分组($b_{\text{simple}} = 0.43$ 、 $SE = 0.02$ 、 $t = 21.19$ 、 $p < 0.001$)中,自我实现获得感对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两组斜率差异显著, $Z = 3.18$ 、 $p < 0.001$;对于预期性维度,在低分组($b_{\text{simple}} = 0.36$ 、 $SE = 0.02$ 、 $t = 20.16$ 、 $p < 0.001$)和高分组($b_{\text{simple}} = 0.51$ 、 $SE = 0.02$ 、 $t = 26.34$ 、 $p < 0.001$)中,自我实现获得感对幸福感影响显著,且两组斜率差异显著, $Z = 5.30$ 、 $p < 0.001$ 。

六、分析与结论

(一)美好生活测量结构与问卷编制的合理性

本研究构建了由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三个分量表组成的“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评价问卷”,为科学测量和精准把握中国公民美好生活状况,提供了有效的基础性调查工具。其中,除幸福感分量表外,获得感和安全感分量表都是本研究自行开发编制的。在获得感分量表中,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自我实现三个维度,较好地贴合了本研究对获得感概念的操作性定义表述,体现了公民在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过去与未来三个方面,基于现有生活状况进行“纵一横”两个方向比较后,所获得的积极主观体验。在安全感分量表中,我们对测量结构的构建突破既有研究的思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将维度划分由“影响安全感的具体因素”转向了“时间线索”,形成了“即时性和预期性”两个安全感维度,进而从发展取向反映出个体对其现有生活各方面所具有的认知与信心。总体来看,不论是本研究自编的获得感、安全感分量表,还是选用的幸福感分量表,均表现出较好的结构效度和信度,可以作为其他相关研究的测量工具予以使用。

(二)中国公民美好生活的表现特征与差异来源

从对美好生活感知的评价结果来看,中国公民处在中等偏上的水平,显示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国家过去各个方面所取得成绩的广泛认可。具体来看,我国政治、社会、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的现实状况稳定、向好,同时人民群众对国家未来的发展还表现出极高的信任和信心,因而在安全

感的得分上表现最高;其次是基于社会发展、自我实现和民生改善三个维度的获得感评价,处在美好生活体验得分的中间位置;而较安全感和获得感而言,幸福感的得分最低,从侧面印证了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仍未得到有效满足这一事实。此外,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比较结果,也再次显示了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客观性、准确性和科学性。中国公民在性别、学历、城乡以及收入等多个指标上反映出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不同类型群体之间在共享改革成果上存在有客观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期望所既存的基准差异。在今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上述差异结果都应当是予以重点关注的关键点,其中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就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等多个方面。

(三)有关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逻辑关系的解读

作为美好生活需要是否以及何种程度得到满足的整体性反映指标,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初步检验。已有研究指出,获得感是提升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基础。然而,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本研究发现:获得感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变化,同时还会通过其安全感体验发生作用;也就是说,人们在不同领域或方面的获得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其对当下现实和未来预期各个方面稳定性的认知和信心,进而使其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体验予以提升,产生更强的幸福感知。公众的幸福不仅来自于既有的个体处境改善,同时还来自于发展与稳定基础上所带来的个体生存保障与积极预期,由此构成了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机制。此外,个体的获得,是与其失去或被剥夺相对应的;一旦个体感知到自身“所获”有“损失”或存在失去的风险,则其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势必发生变化。在本研究中,无论是获得感的整体感知,还是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自我实现这些具体维度,其与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关系,均受到个体安全感体验的调节影响。可以说,安全感不仅是影响获得感与幸福感关系形成的重要连接因素,同时还是二者关系作用发挥重要的催化因素。随着人们安全感知水平的下降,幸福感受到获得感的影响效应也会发生显著的降低。这启示我们,在国家治理推进和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过程中,要有意识关注、强化各项民生政策、惠民措施等治理绩效的稳固化和制度化,进而不仅让人民群众在分享到改革发展成果后“舒心”,还要让他们的这种“舒心”预期可见、长久持续,从而更加“放心”;最终,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真正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满足后的幸福感。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构建了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评价的测量结构与工具,并探讨了安全感在获得感与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调节作用,但仍旧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本研究样本获取并非完全随机抽样,使得本文对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评价的整体性描述存在一定的代表性不足问题。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优化抽样方案、扩大数据规模,从而提升对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推论效力。第二,本研究仅对美好生活感知的内部“三感”关系进行了探讨,而对于该主题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分析尚未充分涉及。未来研究需对其进行系统设计,将主客观因素、多领域变量统筹纳入研究计划,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好生活理论体系。第三,本研究属于探索性基础研究,在理论贡献上还需更进一步。未来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美好生活感知与社会科学经典核心变量(诸如政治认同、政府信任、社会公平、公众信心等)之间的因果关系机制,进而形成具有学科知识增进、理论发展创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郑建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市,100732)

(责任编辑:孟令梅)